

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同比减少200万,国家统计局:今后会继续减少 让大家生了,大家怎么又不生了?



国家统计局1月23日发布消息称,按当前育龄妇女数量、结构和生育水平测算,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会继续减少,但人口总量仍然处于相对平稳的增长期。

最新数字显示,2018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比2017年减少20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比2017年下降1.49个百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下降1.51个百分点。分析历年数据可以发现,2018年出生率为1949年以来历史最低值,同时劳动人口数量也是首次下降。

无独有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也给出了不太乐观的数字。1月23日,在中国人口数据与政策建议研讨会上,与会的人口研究专家、学者纷纷表达了对人口减少的担忧。

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

新年伊始,中国邮政正式发售己亥猪年邮票,其中有一枚叫作“五福齐聚”,两只大猪领着三只小猪的画面难免令人浮想联翩——难道是生育政策即将放开,允许生三孩?再联想到2018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相关方案将3个与计划生育相关的司全部撤销,使得这个猜测似乎变得更加“靠谱”。

不过,全面放开生育的小道消息并没有引起年轻人多大的兴趣,他们对待此事的态度非常淡漠,很少有人为了这件事而感到欢欣鼓舞。

这两天,还有一个统计数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大家纷纷惊呼“最爱生娃的山东人也生不动了”。据统计,山东省烟台地区在2018年上半年新生儿数量同比下降了16%,青岛地区更是下降了21.1%。除了这两座城市,山东其他地级市的新生人口数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对于中国的人口而言,21世纪上半叶最大的人口事件莫过于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经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人,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2050年减少到13.64亿人,2065年减少到12.48亿人,即缩减到1996年的规模。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左右出现,2065年人口将减少到11.72亿人,相当于1990年的规模。

丁克族不指望“养儿防老”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表示,中国每年的新生儿数量大幅减少的原因有三:首先,堆积效应结束。按照中国正常的生育意愿,大概有一半家庭会生育二孩。2017年,二孩生育数比一孩多

22%,这意味着现在的出生人口里面二孩有非常大的堆积反弹。堆积效应结束后,新生儿数量会有所下降。其次,育龄高峰期女性数量大幅下降。数据显示,22岁到30岁女性的数量10年间减少了40%,而且最近几年结婚的人数正以每年5%的速度递减,预计未来一孩人数也会继续下降。第三,相对于80后,90后的生育意愿在下降。2016年,一孩的出生率只有68.8%,个中原因涉及城市化、教育的提升、观念的改变等。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传宗接代”“无后为大”的观念根深蒂固,很多家庭都把生孩子当成了一种责任,认为不生孩子的人生是不完整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很多90后已经不再信奉这个观念,他们生活得更加自我,不认为人生的价值仅仅是养育后代,结婚和生育已经分离开来,他们渴望自由自在地生活,更看重自身的快乐,不愿以牺牲个人的幸福、快乐和轻松为代价去换取所谓的家庭完整、子孙昌盛。

“不要孩子,将来谁给你们养老啊?”这句话是人们善意劝说别人生孩子时最常用的理由,王丹不知道听过多少次,可是她并不以为然。“现在谁敢说将来孩子一定会给自己养老?”被她这么一反问,对方也就哑口无言了。确实,劝人者都不敢保证自己的孩子将来就一定尽到养老的责任,反倒是啃老族、空巢老人成了这几年的热词。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已经能够接受养老院养老,或者社区养老。养儿防老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

谁来帮职场女性看孩子?

中国妇女就业的机会成本非常高,女性在职场打拼,一旦生育孩子,就很可能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很多要强的职场女性把生育这件事情一拖再拖。等到生育过子女重返职场之时,则又不得不面对孩子没人带的难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梁建章谈道:“中国现在几乎没有托儿所,即便之前有过托儿所,如今几乎都消失了。然而,一些提升生育率比较成功的国家,不仅设有托儿所,而且入托率还相当高。比如:法国一半的0至3岁的小孩是入托的,但中国的这个数字非常低,几乎是个位数。如果这么测算的话,中国需要50万家托儿所。”

小严一直死扛着,就是不肯生孩子,原因就是将来没人帮着带孩子。她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还健在,八九十岁高龄而且疾病缠身,父母在家照顾四位老人就已应顾不暇了。公公尚未退休,婆婆忙着帮妯娌照看孩子。因此,小严只能把生育计划一再拖后,挨到38岁终于打算要孩子了,却发现已经成了高龄孕妇,成功怀孕都很困难。

养娃难解“成长的烦恼”

高颖来自那个“最爱生娃”的山东省,她的父母各有4个兄弟姐妹,算得上是一个大家族。她有一个女儿,已经上幼儿园了,眼下正是生二孩的好时机,但夫妻却一致决定不再要孩子,即使父母的念叨已经快把他们的耳朵磨出了茧子。

“不亲身体验一把,谁能理解一个母亲的辛苦?”孩子爸爸一年当中有一多半时间都在外地工作,照顾孩子的任务完全落在了高颖身上。孩子的奶奶虽然能来帮忙,但年纪大了,又有心脏病,只是稍微搭把手而已。在女儿8个月之前,高颖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晚起来喂三四次奶,孩子一两岁的时候,每时每刻都要她抱着,累得腰肌劳损。有时候,来了紧急工作要处理,孩子却闹着找妈妈,她不得已只能把孩子推到一边,闹急了甚至打一顿,看着孩子挂着眼泪睡着了,高颖心里特别难受。有一阵子,孩子生病,奶奶累得心脏病复发,高颖正为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只能求闺蜜来家帮忙照看孩子,抽空请两个小时的假送孩子去医院,然后再去医院照顾奶奶,只恨自己没有三头六臂。先生打来电话,她对着话筒号啕大哭……

女儿上幼儿园了,高颖发现,真正的烦恼才刚刚开始。虽然一直不认同“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眼看着班里的小朋友都去上兴趣班、学舞蹈、学英语、学跆拳道、学溜冰……他们也坐不住了。私立幼儿园加上兴趣班,孩子每月的花销都在七八千元,高颖夫妻觉得,他们养育女儿已经是赔了脚丫了,实在没有能力再生一个。高颖笑称:“现在谁劝我生二孩,我都觉得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专家呼吁为养育家庭减负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李希如表示,“全面两孩”政策对促进生育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二孩出生数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孩出生数量减少的影响,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此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但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潜力很大。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则建议,像许多处于生育转变阶段的国家一样,中国在完成了转变之后很快走向了很低水平的生育率。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导致高度的老龄化和人口衰退,从而给社会经济带来多重挑战。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处于很低和极低生育水平的国家都采取了支持和鼓励生育的政策。

梁建章和黄文政的研究认为,政府应该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敢于生、乐于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

(京晚)

大龄剩女不是问题 农村剩男才是真正危机

最终承担中国男女性别失调后果的主要人群,往往是农村男性青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8年年末,男性人口71351万人,女性人口68187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4。按照总人口数量来计算,中国大陆男性比女性多出3164万人。14亿人,男女人数有3000万的差异,看起来并不多,但是更关键的是男女差异的年龄结构。

农村男青年成性别失衡恶果的主要承担者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60-64岁性别比为100.03,该年龄段是我国男女性别比例最为平衡的阶段。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性别比例失衡逐渐加大,到了00后出生的时候达到顶峰。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各年龄段男女性别比数据显示,在1994年以后出生的人群中,我国男女性别比已经突破110。其中,20-24岁性别比为110.98;15-19岁性别比为117.7;10-14岁性别比为118.46;5-9岁的性别比为118.55;0-4岁的性别比为114.52。

也就是说,中国的年龄失衡主要集中于正在进入婚姻的年轻人群中。在“90后”年龄段,性别比已经突破110,而到了“00后”则更加夸张,性别比最高达到118.55——大约18%的男生无法配到同年龄段的女生。

而且,在统计数字揭示的年龄结构性问题外,还有中国年轻人的性别失调,地域上的结构性问题。

现在城市里高知识、高收入的大龄女青年的婚姻问题,是社交媒体的常见话题。

相比之下,农村里面因为贫穷娶不上媳妇的年轻男性,却在社会视角之外。但他们造成社会问题的能力却未必小。

很多人认为,男女性别比例悬殊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男性可以找任何年龄的女性,自己年龄段的性别比例失调,只需到更小年龄层的人群中去寻找配偶即可。

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男性向更年轻年龄段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挤压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如此循环,比例失调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更何况,在与自己年龄相当的女性中找不到配偶,又凭什么能找到更年轻的女性呢?

实际上,年龄挤压未必存在,真正存在的,是有钱、有资源的男性,对相对弱势的男性青年的挤压。那么,在城乡分化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整体上看,就是城市男青年对农村男青年的挤压。

所以,最终中国男女性别失调后果的主要承担者,往往是农村男性青年。而令人感叹的是,重男轻女观念严重的往往是农村。所以,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农村男青年的父母,当年一手造成了他们现在的困境。

剩女是群体问题,而剩男是一个阶层问题

男性到了结婚年龄,性生理需求没法解决,可能促成性交易行业潜滋暗长。非但如此,未婚男青年对女性的需求,还会导致贩卖妇女、甚至跨国贩卖妇女产业的发展,犯罪率增高。

城市大龄女青年往往是因为要求高,不能达到自己预期而未步入婚姻,她们不会对社会有什么抱怨。剩女是一个群体问题,但并不是一个阶层问题。相形之下,农村男青年因娶不到老婆,发现处于社会底层的自己在婚姻上没有竞争力,很可能心生不满,从而走上破坏社会的犯罪道路。从这个角度看,剩男是一个阶层问题。

所以,中国社会需要警惕性别失调的阶层分化后果,积极应对。

消灭重男轻女现象是长期的任务,城市化、第三产业的兴起,都有助于这个过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06年以来,中国男女比例失衡状况逐年缓解,男女比例已连续12年下跌。数据显示,2011-2017年,男女人口数量差从2011年的3401万人,减少到2017年的3266万人。而到了2018年末,中国男性只比女性多出3164万。这种性别失衡的恢复,正是因为经济转型、城市化进程,使得男女的差别变小,人们对孩子的性别也就不再那么执着。

尽管观念的改变、人口比例的恢复是个长期过程,但这仍需“日积跬步”式的努力。(新京)